

· 修 · 辛 · 学 · 丛 · 书 ·

王德春



语体略论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

107
107

修辞学丛书

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

语 体 略 论

王 德 春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福州

修辞学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德春

顾 问 倪宝元

常 务 编 委 袁 晖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安龙 王德春 卢起和

朱泳燚 林承璋 袁 晖

倪宝元 梁 超 谭永祥

修辞学丛书

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

语体略论

王德春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安县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875 印张 122千字

1987年9月第一版 198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440

ISBN 7-5334-0014-3 书号：7159·960
H·5 定价：1.00 元

出版说明

为了发展修辞科学，普及修辞知识，促进修辞教学，中国修辞学会华东分会编辑了一套修辞学丛书，分别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这套丛书包括修辞学的一般理论、辞格、语体、风格、篇章、词句表达、作家作品的语言研究、国外修辞学的评介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各册在内容上有所侧重，尽量避免不必要的重复，但也注意必要的照应和联系。

这套丛书以普及修辞知识为主，也反映作者新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既要理论联系实际，注重语言的运用，又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有所创新。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得到了许多语言学家的热情指导和广大作者的积极支持，我们特表示衷心感谢。但是，由于我们编辑这种具有相当规模的修辞学丛书，还缺乏经验，其中定有疏漏和错误之处，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语体略论》是作者对语体进行长期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九章，二十三节。本书对各种语体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

体系周密，立论正确，例证典型、丰富，是解放以来我国第一部探讨语体学的专书。此书对于深入开展语言学、特别是修辞学的研究，对于推动语言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指导语言使用，都有重要意义。

目 录

一 语体概述

- (一) 语体研究简史 1
- (二) 现代语言学的语体概念 9
- (三) 语体的分类 21

二 谈话语体

- (一) 谈话语体的功能 26
- (二) 谈话语体的特征 32
- (三) 谈话语体的作用 47

三 书卷语体之一——科学语体

- (一) 科学语体的功能 52
- (二) 科学语体的特征 57
- (三) 科学语体的分体——通俗科学语体 66

四 书卷语体之二——艺术语体

- (一) 艺术语体的功能 73
- (二) 艺术语体的特征 78
- (三) 艺术语体的分体 87

五 书卷语体之三——政论语体

(一) 政论语体的功能	(109)
(二) 政论语体的特征	(116)
六 书卷语体之四——事务语体	
(一) 事务语体的功能	(124)
(二) 事务语体的特征	(125)
(三) 事务语体的分类	(135)
七 语体的相互关系和语体的发展	
(一) 语体稳固性和变动性的矛盾统一	(142)
(二) 语体之间的排斥性和渗透性的矛盾统一	
	(148)
八 语体和修辞方法、风格	
(一) 语体和修辞方法	(156)
(二) 语体和风格	(162)
九 语体理论的实践意义	
(一) 语体理论推动语言学的研究	(170)
(二) 语体理论对语言教学的指导意义	(171)
后记	(181)

一 语体概述

(一) 语体研究简史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科学领域研究的深入，可能出现新的术语，也可能使原有的术语产生分化。

在我国传统语文学和文学理论范畴内，语体和文体两词曾经通用^①。随着现代修辞学对功能风格、言语功能变体研究的深入，它们已分化为两个术语。文体指文章体裁的类别，而语体则指功能风格、言语功能变体。鉴于上述原因，本书在叙述语体研究简史时仍尊重历史事实，沿用“文体”的名称，两词分化后再加以区别。

我国对文体的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晋代就有李充的《翰林论》和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②。这两本书虽久已散失，但是南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前五卷则分别吸收了他们以及其他各家的论点，成为文体论的集大成之作^③。在

① 《辞海》（缩印本）第153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② 参阅《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明]吴讷、徐师曾著，于北山、罗根泽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

③ 参阅《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郭晋稀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文心雕龙》中，讨论了形式与内容的关系，语调辞令表达内容的方法等等问题，不过它的研究重点主要是作品的书面形式。

隋唐以后，陆续产生了一些新文体，也陆续有人对此进行论述。到了明代，又有文体论的新作品问世，那就是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

此后，不断有人对文体问题进行探讨，但一般说来，从刘勰起，都偏重于对文章体类进行划分和论述。语体、文体虽是通用词，但用在这个意义上，“文体”似乎更常见、更贴切。

在国外，古希腊的“演讲术”就对文体进行了研究，亚里士多德当时把“演讲术”分为法律演说、政论演说、表演演说等类。古希腊学者还进而把语言体式分为三类：高雅体、中间体和低俗体。例如写英雄史诗、颂歌要用高雅体；诗体书信、哀歌、牧歌要用中间体；喜剧、歌曲、生活琐事的描写则用低俗体。这种分类方法对后代有很大影响。古印度传统修辞学对文体、风格也进行了研究。

但在现代语言学建立以前，在古代语文学和历史比较语言学时期，对文体、风格方面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现代语言学建立以后，欧洲的一些学者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一九〇〇年左右，瑞士语言学家巴利(Charles Bally)根据德·索绪尔(F·D·Saussur)区别语言(*la langue*)与言语(*la parole*)的理论，力图建立一门研究语言表达方式的科学——修辞学，以便努力从整体上研究言语事实。

但实际上，巴利的修辞学主要还是语言修辞学，着重研究语言的表达手段。

巴利在他的《法语修辞学》一书中表述了语体的概念，并作了论述。他首先阐明语体与个人语言特征和作家风格的区别，指出修辞学研究的是某一社会集团习用的语言表达方式，而不是个人的语言特点。他特别强调，语体与作家或演说家的风格迥然不同，在相当程度上排斥作家言语风格的研究，从而抹煞了作家对于全民语言的影响。他由于强调语言的表达功能而成为“表达修辞学”的代表人物。

巴利认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首先是词语的“感情内容”。他认为语言虽然直接与思想联系，表达概念，但人的言语活动又总不免要表达各种感情色彩。因此，修辞学的任务在于：首先抽象出一种由“纯概念”构成的、不包含感情成分的“理智的表达方式”，然后与之相比较，就有各种词语的“感情内容”。因此，语言体系中的语言单位就出现了按语体的修辞分化。

巴利着重探讨了“词语的感情特征”。同义手段的各个成员，除代表“纯概念”的词语之外，都具有理智或感情上的附加特征。这种具有附加特征的语言手段成为语体分化的物质材料。

巴利的“间接效果”这一概念对于语体研究有较大影响。由于存在着性别、年龄、职业、社会和民族等环境因素，在这些环境中所习用的语言材料，在人们头脑中同各该环境中的活动形式相联系，并因此而在人们的感受上留下各种不

，同的印象，这种印象就是“间接效果”。

巴利在论述环境因素时指出：存在着一种与中等智力和社会地位相应的“普通语言”，并以此为中心，依赖环境因素向上、下两个方向展开。一般说来，“书卷语”适应于较高的智力和社会地位，谈话语（包括“亲昵语”、“大众语”、“俗语”和“黑话”）则适用于不同程度上更为低下的环境。巴利按照智力和社会地位这一标尺对语言变体进行了统一的排列。它们包括会话语、亲昵语、行政语言、职业方言、隐语和黑话等。这就是巴利的语体分类。

总之，他认为语体研究的任务是调查语言的表达力，着眼于语言表达感情并影响感情的性能。其研究方法是将现代法语中的各种表达手段加以描述和比较，概括出现代法语的语体。

由于巴利等人的风格、语体理论是建立在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基础之上，他们也就和索绪尔同样地强调共时研究，割断或排斥历时研究。

由于深受索绪尔理论的影响，巴利等人一般只研究本族语，着重现代全民语言及其变体的研究。

与巴利不同，德国学者浮斯勒（Vossler）、施毕策（Spitzer）、库第写斯（Curtius）和奥沃巴赫（Auerbach）等人以研究外国语见长，并重视研究个别作家的语言风格。他们受克罗齐（B·Croce）美学理论的影响，企图通过文体研究来阐释一个民族的精神。他们采用的方法是凭借研究者的修养、直觉、灵感，从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的语言

特点寻找共同的心理因素，其目的在于将语言和文学结合，使语体学更紧密地同文学史、艺术史乃至整个文化史联系起来。

在苏联，关于语体、风格方面的研究，历史悠久，理论建树也较多。

早在十八世纪，罗蒙诺索夫就把古希腊的三体理论与当时俄语词汇的使用联系起来，建立起标准语的修辞规范。当时斯拉夫词语在俄语中仍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罗蒙诺索夫反对使用陈旧的斯拉夫词语，主张在高雅体诗歌中使用尚活用的斯拉夫词语，而在中间体和低俗体著作中则应尽可能多用地道的俄语本身的词语，在低俗体中还可使用俗词俚语。

到了十九世纪，俄国修辞学着重研究了实践修辞，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各种修辞格和文艺作品语言，包括作家运用修辞手段和作家风格等。

本世纪二十年代，苏联对文艺语言的研究仍很兴盛，其特点是力图找出文艺作品风格在语言形式上的特征，确定语言在创造文学形象上的作用。

与此同时，苏联逐渐形成了功能修辞学，着手研究文艺语言之外的各种功能风格，即语体。维诺格拉多夫等强调应从功能角度来研究语言，研究语言在不同社会交际情境和言语形式中的使用。

从五十年代起，《语言学问题》杂志开展了修辞学大讨论，讨论持续达一年之久。维诺格拉多夫为上述讨论写了长达两万余字的总结。这次讨论推动了修辞学理论，特别是语

体理论的研究。

M·科任娜指出，功能修辞学的发展是现阶段修辞学的典型特征。

近二三十年来，苏联语言学界积极进行对话语的研究，成立了许多话语研究中心，出版了数百部论著。如苏联科学院俄语研究所的专著《俄语话语》（1973），施维多娃著《俄语话语句法概论》（1960）。在施维多娃的书中，运用了丰富的材料阐述了语体问题。

一九七七年施麦列夫在《各种功能类别的俄语》一文中，提出了关于语体的基本问题。

科学语体、政论语体、事务语体以及语体发展的研究也都有了很多成果。许多学者在进行研究时除了运用传统的方法，还运用了统计方法，在莫斯科、基辅、萨拉托夫等地还成立了语体研究中心。

总之，苏联学者用描述、比较为主的研究方法着重研究全民语言及其变体，同时，也不忽视对个别作家的风格研究。

语体研究在五十年代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①。一九五八年在印第安那大学举行了会议，一九六〇年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语言中的语体》，该书从三个方面——结构语言学、心理学、文学批评——共同探讨语体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一九七一年出版的《文学语体讨论会汇编》收集了一九

^①参阅王佐良《英语文体学论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0年版。

六九年在意大利贝拉焦举行的会议的论文与讨论摘要。该会议环绕着语体问题进行了各方面的讨论。

在英国，与过去文艺批评式、修辞讲话式的文章不同，出现了用现代语言学观点撰写的专著。其中一九六四年出版的斯宾斯 (J. Spencer) 等人合著的《语言学与语体》是一种初步的探讨；而达皮舍 (A. E. Darbyshire) 一九七一年出版的《语体的语法》则运用了乔姆斯基 (N. Chomsky) 的转换语法理论来谈语体。

达皮舍在《语体的语法》一文中提出研究常规与偏离的语言特征。他认为语体是受情境制约的语言变体。不同环境迫使不同的人，有时还使同一个人，以不同的方式使用语言。由此产生了语言的常规与偏离特征。此外他还提出了“共核”这一概念，共核指的是在各种语体中常用与通用的基本成分。共核既是中性的又是中心的，在语言使用中，共核特征占优势，从而体现出全民语言体系是语体的物质基础。

新弗斯学派 (Neo-Firthian Linguistics) 英国的哈利迪 (M. A. K. Halliday) 提出“语域”（使用域）概念。他们认为除了研究语言结构以外，还要研究语言和环境的关系。语体学研究由于使用场合不同而产生的各种使用域变体，而使用域的特征表现在语言结构上。

一九六四年，哈利迪把语域分为话语范围、话语方式和话语风格。所谓话语范围指政治、生活、科技；话语方式指口头、书面；话语风格指交际者的地位、关系、身份。由上述三个范畴来区分语域。

上述是国外古代、现代语言学各派对语体研究的简况。那么，我国对语体研究的状况如何呢？

我国古代从文学体裁的角度来研究语体问题，当推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代表。自一八九八年《马氏文通》问世后，我国的语言学研究逐渐引进了西方语言学的一些研究成果。在修辞学方面，一九三二年陈望道先生出版了《修辞学发凡》。这本书主要是研究辞格问题，仅在书中第十一篇第一节中谈了一下语文体式的分类^①。而这种分类又是兼顾地域、时代等等因素的分类。

陈先生在一九六二年重版《修辞学发凡》时，对此节略作增改，将与语体有关的部分改作：“目的任务上的分类，如通常分为实用体和艺术体等类，或分为公文体、政论体、科学体、文艺体等类，都可以说是属于这一类。”^②但对此问题没有展开论述。

张弓先生于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代汉语修辞学》一书，将语体问题另立章节加以阐述。他从语言学角度阐述了汉语语体问题，将汉语语体分为两大类、四个变体，并叙述了语言因素同语体的关系。^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语体的文章散见于各报章杂志上。我曾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在《文汇报》上发表文章，提

①参阅陈望道《修辞学发凡》第383页，开明书店1950年版。

②见《修辞学发凡》第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③见《现代汉语修辞学》第228页，张弓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出要建立语体学、风格学。后来又写了专门的论言语环境和论语体的论文^①。

王佐良先生所著的《英语文体学论文集》汇集了他的九篇文章，论述了英语语体问题。

（二）现代语言学的语体概念

前面谈到语体在语文学和文学理论范畴内曾经和文体是通用词，而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尤其是现代修辞学的出现和发展，语体和文体这两个术语已开始分化，这里具体地阐述现代语言学的语体概念。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使用语言的人都是在特定的环境，即在特定的场合，就特定的范围，为特定的目的，向特定的对象进行交际。这特定的环境对语言的使用提出了特定的要求。

一个几千人集会上讲演在使用语言材料上的特点就不同于几个亲友间的谈家常。例如下面两段话语：

（1）评委们在反复斟酌获奖篇目的时候，都感到美不胜收，不免遗珠之憾。我们珍视这次评选的结果。其中许多篇，报刊上早有佳评。

（《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作品集·张光年讲话》，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①参阅《修辞学探索》，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

(2)……陶坷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象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徐怀中《西线轶事》，《人民文学》1980年11月号）

例（1）用词造句很严谨，使用了如“斟酌、珍视、佳评”等书卷语词，同时又使用了“美不胜收、遗珠之憾”等熟语。此外，句子结构较完整，句子较长，可以看出说话人的深思熟虑。例（2）的对话则完全是轻松、活泼，富于生活气息。这里使用了“好看、开心”这样的谈话语词，甚至还使用了“滚”、“亲娘老子”这样的通俗语词，从而增加了母女之间亲昵的感情色彩。同时，句子结构较简单，句子也较短，读起来通俗易懂，亲切感人。可以感觉到说话人在这种情况下无拘无束，亲密、自然。

同样，一篇科学论文和一首诗歌在用词造句上也有差异。例如：

(3)离太阳较近的四个行星（水、金、地、火）的物理特性与地球相似，叫类行星。它们的体积都较小，半径从两千多公里到六千多公里；平均密度较大，为 $3.8\text{--}6\text{克}/\text{cm}^3$ ，自转速度较小，自转周期都大于一天
.....

（河北师大等校合编《普通自然地理》，